

中国历史知识全书

中国古代历代帝王 (八)

韩文 主编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历史知识全书/韩文主编.

—延吉: 延边大学出版社, 2004.8

ISBN 7-5634-1722-2

I. 中…

II. 韩…

III. 历史知识—少年读物—课外—中国

IV. Z228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11159 号

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吉林延吉市公园街 105 号 邮政编码 133002)

中铁十六局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32 开 450 印张

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1 000 册

定价: 1188.00 元(本卷 16.50 元)

目 录

◎世祖(福临).....	1
◎圣祖(玄烨).....	48
◎世宗(胤禛).....	84
◎高宗(弘历).....	176
◎仁宗(顒琰).....	197
◎宣宗(旻宁).....	198
◎文宗(奕訢).....	198
◎穆宗(载淳).....	198
◎德宗(载湉).....	199
◎宣统帝(溥仪).....	204

◎ 世祖(福临)

出生：公元 1638 年——去世：公元 1661 年(在位 18 年)

顺治帝福临，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。他是皇太极的第九子，生于崇德三年(1638)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在沈阳即位，改元顺治，在位 18 年。卒于顺治十八年(1661)，终 24 岁。

因爱而亡的皇帝——顺治

清顺治十七年十月初八日，是清宫中一个不寻常的日子，这一天，在景山殡葬帝后前的享殿——景山观德殿外，建起了规模可观的水陆道场，即将为一位仙逝的皇妃娘娘举行火葬。在这个大道场中，设有忤坛、金刚坛、梵网坛、华严坛、水陆坛，高坛林立，蔚为壮观。白幔、挽帐随风飘逸，笙管笛箫，哀音阵阵，听着肃穆，透着哀婉和悲凉。一百零八名僧人，身披袈裟，手击烧钹，口诵经文。烧钹声、诵经声，萦绕山颠，直上云霄。各级官员人等，穿梭其间，毕恭毕敬，焚楮铂，烧纸钱，各司其职。这里最令人瞩目的是一位身披大红袈裟，手持王如意的高僧茆溪禅师，正在主持这位贵妃娘娘的葬礼。那么，是谁死后享此殊荣，竟如

此兴师动众，大做法场？原来，这就是当朝顺治皇帝最宠爱的皇贵妃，死后被迫封为皇后的董鄂氏。

董鄂皇贵妃以二十二岁的青春年华病逝于承乾宫。真可谓红颜薄命，一朵盛开的鲜花正在娇艳的时节，却突然谢却红尘，香消魄散。痴情的顺治皇帝，对贵妃娘娘的早逝哀痛不已，竟然一会儿寻死觅活，一会儿又闹着要出家去当和尚。并下令将承乾宫内大小太监、宫女等三十余人全部“赐死”，以备皇妃娘娘在阴曹地府役使，这么多人生殉，造成清宫罕见的一大惨案。一时间将紫禁城内闹得天昏地暗。

顺治皇帝是一位痴情皇帝，属于那种“不爱江山爱美人”，追求纯真爱情的人，比其父皇太极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他对爱情专一、愿为心爱者抛弃一切，甚至为她去死。所以，董鄂氏的早逝，使他看破红尘，万念俱灰。认为“财宝妻孥，人生最贪恋摆拨不下底，朕于财宝固然不在意中，即妻孥亦觉风云聚散，没甚关系”。他想为爱妃而死，自然不成，况且在封建社会里，身为帝王，且上有高堂，觅死便为大不孝。既死不成，又欲遁迹空门，愿清灯古佛，伴其终生，以求精神上的解脱，然而又有皇太后“挂念”，想“随老和尚出家去”，也未成

行，皇冠仍然戴在他的头上，死也不行，皈依佛门也不行。从此一蹶不振，终日郁郁寡欢。使这位身体素质本来就十分羸弱的皇帝更加虚弱。结果，在爱妃董鄂氏死后仅半年就染上天花，不久便死在养心殿，追随着他的爱妃而去了。只留下风流天子爱美人的佳话。顺治帝的尘缘虽然短暂，但他的风流韵事却不少。在这位令顺治帝如痴如醉，爱之疯狂的皇贵妃之前，他曾有过两位皇后，还有福晋、格格等妃嫔不下三十余人。得到董鄂氏之后，顺治皇帝有心立其为后。但终因董鄂氏的恳请，更由于孝庄皇太后的坚决抵制，废立之念才没有实现。直至董鄂氏病歿，顺治皇帝总算请得皇太后的恩准，追封为皇后，遂了顺治帝的最终心愿。如此，顺治帝一生实际有三位皇后，前两位一废之，一远之，惟有董鄂氏才是他称心如意的人儿。

但这位皇帝心上人的入宫经历却颇蹊跷，《清史稿·后妃传》只作了简要的记载，说此妃为“内大臣鄂硕女，年十八、入侍。上眷之特厚，宠冠后宫。十三年八月，立为贤妃。十二月，进皇贵妃。行册立礼，颁赦，上皇太后徽号……十七年八月薨，上辍朝五日，追溢孝敬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。”这寥寥数语，概括了董鄂氏的生平，却给

后人留下了诸多疑问。首先，从顺治皇帝第二次选后起，内廷主位已来自遴选的秀女。而董鄂氏十八岁才入宫，已经逾岁，似乎不是秀女出身。那么，她是怎样入侍到顺治皇帝身边，并引起顺治帝如火如荼一般的恋情呢？

据当时与顺治帝过从甚密的钦天监监正，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在他的回忆录中说：“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，起了一种火热爱恋。当这位军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时，竟被对于他这申斥有所闻的天子亲自打了一个极怪异的耳掴。这位军人于是乃因愤至死，或许竟是自杀而死。皇帝遂将这位军人的未亡人收入宫中，封为贵妃。这位贵妃于一千六百五十七年产生一子，是皇帝要规定他为将来的皇太子的。但是数星期之后，这位皇子竟而去世，而其母于其后不久亦薨逝”这里所说的“满籍军人”，很可能就是顺治皇帝的异母弟，太宗皇太极第十一子，和硕襄亲王博穆博果尔。他在顺治十三年七月突然死去，八月，董鄂氏进宫，封贤妃。

在博穆博果尔生前，作为弟媳的董鄂氏如何能与皇兄接近，使之目睹其花容月貌，进而对她产生一种“火热爱恋”，应归咎于清初宫廷制度中的弊病：清初凡逢太后万寿节或皇后千秋节等庆贺宴赏

活动时，有王公贝勒福晋及文武大员命妇进宫入侍及行礼陪宴等礼仪。如此，董鄂氏作为弟妇入宫的机会是极多的。而风流倜傥的顺治皇帝，见弟妇如此楚楚动人，美若天仙，遂引起他一种疯狂的恋情，也就顾不得许多了。不管博穆博果尔是忧愤病死也罢，或自杀身亡也罢，他的死，成就了顺治帝的这段姻缘。何况清初皇室婚姻，在道德观念上与汉族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观不同，不论“兄死弟妻其嫂”或“弟卒兄妻弟妇”，均视为平常。顺治帝自得了董鄂氏之后，大有“只羨鸳鸯不羨仙”之感，如若拿“江山”与“美人”令其取舍，他会宁取后者的。所以自董鄂氏入宫的四年的时光里，她所得到的恩宠，乃至死后所得的殊荣，在清帝后妃中堪称是空前绝后的。董鄂氏的美貌及温柔贤淑，得到顺治帝的专宠。转年十月，皇贵妃又产下一子，虽非中宫所出，但宠妃诞育皇子，非同寻常。何况在顺治的心目中，皇贵妃本当为皇后，其子也就该为皇嗣。所以他将这位排行第四子，却称为“皇第一子”，实则视为皇太子。因此，高兴之际，又颁诏书，使天下共知。同时大赦各种人犯，豁免积欠钱粮等，使普天同庆，“共被恩泽”。

遗憾的是，这位备受皇父母妃钟爱，拟立储君

的小皇子，来到世上刚刚四个月便夭折了。如果说被视为“皇太子”的小皇子的死，已经给了顺治帝精神上一次沉重打击，那么，爱妃董鄂氏的亡，则使顺治的精神完全崩溃，陷入绝望之中。因为他虽拥有众多的妻妾，然而，惟有董鄂氏是他最称心，最中意之人。何况入宫仅相伴四载，便以她二十二岁的青春年华与流水同逝，怎不叫痴情的顺治帝痛断肝肠？董鄂氏年纪轻轻即病歿，大约主要因爱子之丧，忧郁成疾，遂一病不起，至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病逝于承乾宫。

董鄂氏虽死，但其音容笑貌，时时映在多情帝君的眼帘，使他难以忘怀。他曾录唐诗《春梦》一首赠与其交谊颇深的木陈忞禅师：

洞房昨夜春风起，遥忆美人湘江水。

枕上片时春梦中，行尽江南数千里。

正反映了多情天子追忆美人的心清。

董鄂氏与顺治帝之情笃，官书中无载。而从顺治帝为董鄂氏所作的数千言“行状”中，使人们有所了解。而且写得情真意切，催人泪下。顺治帝视董鄂氏，自然是情人眼里出西施，不免褒美，但董鄂氏的确是性格温柔，对人体贴，善解人意。她对皇帝的饮食起居，备至周详；对太后及皇后亦极恭

顺，尤对太后更能承欢膝下；生活节俭，不饰珠翠；虽不干政，但主张宽以待人，垂怜生灵；深明大义，常忧念父兄恃宠而骄横跋扈；对皇帝始终情深意笃，比至弥留之际，仍嘱之“妾歿，陛下宜自爱”。在洋洋数千言的“行状”中，勾勒出董鄂氏的品貌德行，及顺治帝的爱恋悲恻。相传顺治皇帝因爱妃董氏的病逝，而心灰意冷，认为“四大皆空”，无所依恋，便舍弃江山，遁入空门，到五台山剃度修行。后来康熙皇帝虽多次奉国母皇太后(孝惠章皇后)幸五台山，希求夫妻、父子相见，但顺治拒不相认，后终成正果。这位风流天子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。至于戏曲、小说，更演绎出诸多动人的情节，不知使多少人为之动情，抛洒一把多情的泪水。不过顺治帝笃信宗教是实，大约开始于顺治八年，由于当时汉大学士范文程的引见，他认识了年近六旬的德国耶稣会传教士，当时在宫廷供职任钦天监监正的汤若望。从此与之结下了“忘年之交”。又因其母孝庄皇太后拜汤若望为“义父”，顺治帝也就称之“玛法”(满语意为祖父、祖辈)，并常召入宫中，请汤若望讲论天文历法，乃至宗教、政务等等。过从甚密，也是顺治与宗教结缘之始。

顺治十四年(1657)，顺治帝因身边太监的鼓动，遂于南海子召见了当时的佛教高僧憨璞聪，。听了他的一番关于佛教经义的谈论后，顺治帝很是高兴，从此便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不久又延纳南方高僧玉林琇、茆溪森，木陈忞等入京师，供奉之于西苑万善殿，对他们崇礼优渥。十六年，顺治帝竟请玉林琇为他起法名，其初不肯，固请之下依之，顺治自择“行痴”，号“痴道人”。后来在他的印玺铃章中竟有“尘隐道人”，“痴道人”等法号。顺治帝虔心佛事，每以讲经释教为常事，甚至董鄂氏也在他的影响下由不信佛到笃信于佛，直至“口呼佛号而终”。在顺治帝御制《端敬皇后行状》中也说：“后素不信佛，朕时以内典禅宗谕之，且为解《心经》典义，由是崇敬三宝，专心禅学。”

由于顺治帝沉迷于佛事，当他最心爱的人病逝这一无情现实的打击下，便产生悲观厌世，企望遁入空门，以求精神上的解脱。他曾命茆溪森为其削发剃度，决心出家，孝庄皇太后百般劝解，命人急召高僧玉林琇抵京，玉林琇闻知后，一面痛责弟子茆溪森，一面命人取来柴薪，倘若茆溪森敢引顺治帝为僧，就要将其烧死。无奈，顺治帝才勉强答应

蓄发留俗。顺治出家不成，后来只好命他的亲信太监吴良辅作替身，入悯忠寺修行。

顺治虽然年纪轻轻，但身体素来羸弱，又多情善感，爱妃的早逝，对他的身心都造成极大的伤害，结果，董氏病歿仅半年他就染上了当时的不治之症——天花，时称痘证。顺治帝身患痘症，自知命在旦夕，后事安排已刻不容缓。由于清初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立储制度，况且其膝下诸子尚幼，无一个成年皇子，嗣君为谁？使顺治帝躺在养心殿的病榻上辗转反侧，一时难于定夺。最后还是召来了自己与母亲孝庄皇太后都极信赖的传教士汤若望。他虽为异邦之人，但他的话在顺治母子的心目中却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，汤若望认为皇三子玄烨可立为皇太子。因为当时顺治帝的六子中(长子与四子已夭折)，除二子福全和三子玄烨较大外，四个婴幼儿或刚刚呀呀学语，或尚在襁褓之中。而福全与玄烨虽均庶出，一为宁妃所生，一为佟妃所生，但玄烨自幼受到祖母的钟爱，想必汤若望也了解其中情况。而且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是玄烨已然出过天花，而二子福全尚未出过，将来继承皇位，一旦染上此症，难免还会发生眼下类似的悲剧，这是当时的一大忌。因而，顺治采纳了他的意见，也得到诸王大

臣的赞许。

顺治帝死后火化入葬，是清入主中原后的第一位，也是最后一位皇帝，自康熙皇帝始，便循汉制改为土葬了。康熙二年四月二十二日。将顺治宝宫（即骨灰罐）送往遵化孝陵安葬，小皇帝玄烨亦要前往为乃父送葬，但因路途较远，经太皇太后及诸王大臣劝慰乃止。沿途自然有诸多皇家礼仪活动。至六月初六日抵孝陵，举行了隆重的葬礼，并与已逝的孝康章皇后（康熙生母）、孝献章皇后（董鄂氏）合葬。先期曾遣官祭把，陈奉纸锭 3 万、纸钱 3 万、纸帛 3 万，奠宴 25 席、全羊 7 只，酒 15 尊，并宣读祭文，奠酒行礼（《钦定大清会典事例》）。至时，将世祖章皇帝宝位由大臣奉至地宫，安设宝床正中，孝康、孝献二皇后宝位分列左右。除了帝后“神位”外，地宫中只葬有 3 个骨灰罐，而无随葬珍宝。从此，顺治了却了一段尘缘，终于与所爱的人长相厮守了。

顺治帝“下诏求言”为什么失败？

顺治帝登基时才五岁多一点，是个小孩子，大权操在摄政王多尔衮手里。后来顺治帝述忆当时情景说：“昔皇考上宾，朕方六岁，正在幼冲。当时诸王大臣，同心推戴，嗣绍丕基。及定鼎京师，奄

有四海，于时睿王摄政，朕惟拱手以承祭祀。凡国家之事，朕既不预，亦未有向朕详陈者。”（《清世祖实录》，卷 88）1650 年（顺治七年）冬多尔袞去世，接着顺治帝亲政，又经过一年多的政坛风云，这位 15 岁的少年天子才真正掌握了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力。

顺治帝主政后，面临着各种尖锐的矛盾。为此，他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，其中一项就是“下诏求言”。顺治十年四月十七日（1653 年 5 月 13 日）的上谕说：“今年三春不雨，入夏亢旱，农民失业，朕甚忧之。意朕躬有缺失欤？祀享有不诚、诏令有不信、政事有未当欤？抑大小臣工怀偏私，重贿赂，不肯实心为国，旷废职业，以致膏泽不下逮欤？抑当言不言，不当言而言，沽名钓誉，持禄养交，无济于实事欤？抑民间疾苦无所控诉，地方各官不以实上闻欤？著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各抒所见，凡有关朕躬及天下大利大害、应兴应革者，悉心条奏，毋含糊两可，毋借端影射。若所言合理，切中过失，朕不惮改。”（《清世祖实录》，卷 74）这道上谕，言词不可谓不恳切，期望不可谓不殷迫。在以后的几年里，类似的上谕还发过好几次。广开言路，集思广益，调动官员的积极性共同应对政治、

军事、经济各方面所面临的严峻形势，这应该说是
一个很高明的举措。

但是，事实并没有如顺治帝所预期的那样发展。“下诏求言”遭到了群臣的冷遇，效果很不理想。这一点，顺治帝曾多次谈及。如顺治十四年十月十六日(1657年11月21日)，他召集三品以上官员，面谕说：“朕年来屡饰科道各官，据实陈奏，以广言路。乃不抒诚建议，或报私仇，或受嘱托，或以琐细之事渎陈塞责。虽巧饰言词，而于国家政治有何裨补？”(《清世祖实录》，卷112)顺治十七年六月九日(1660年7月15日)又颁旨说：“顷因亢旱为灾，朕省躬引咎，宣谕求言。原欲大小臣工，于朕躬阙失及关系国计民生利害者，指实陈奏，以图兴革。近见入告章疏，多摭拾浮泛修饰繁词，开列款数，沽名塞责，不惟无裨治理，反使虚文愈增，稽误正务。其于朕躬阙失，并内外满汉大小臣工结党循私，贪赃坏法，以及豪右侵渔、商市强霸，一切蠹政害民之事，未见确有指陈，殊负朕省改咨询实意。”(《清世祖实录》，卷136)此事对这位皇帝影响甚深，可以说是终生未能释怀。一直到他即将结束其24岁年轻生命的时候，他还在《遗诏》中专门写了这样一段话：“人之行事，孰能无

过。在朕日御万几，岂能一无违错，惟肯听言纳谏，则有过必知。朕每自恃聪明，不能听言纳谏，古云：良贾深藏若虚，君子盛德容貌若愚。朕于斯言大相违背。以致臣工缄默，不肯尽言，是朕之罪一也。”（《清世祖实录》，卷 144）或者说这份《遗诏》是别人代拟的，不一定代表顺治帝的思想。但无论如何，把这件事情特意郑重其事地写入《遗诏》，表明顺治皇帝“下诏求言”的失败，则是确凿无疑的。

如果我们再进一步作深入的探究，看看“下诏求言”所以落得个失败的缘由，我们会发现，根本原因不在别处，正是在大力倡导此事的顺治皇帝本人身上。“下诏求言”的失败，原因主要有三：

第一、按照顺治帝自己的说法，叫作“居心未净”。用我们现在的语言，就是出发点不对，动机不纯。顺治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（1660 年 7 月 2 日）的一个上谕说：“朕统御寰区，焦心图治。前此屡有引咎省躬诏谕，自今追思，皆属具文，虚邀名誉，于政事未有实益。且十二、十三年间，时有过举，经言官指陈，有即加处分者，有优容宽宥，而此心介介尚未全释者。事有错误，犹可改图，居心未净，政事之流弊必多。”（《清世祖实录》，卷

136)原来，皇帝的“引咎省躬诏谕”，是做做表面文章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“虚邀名誉”，说穿了不过是一种政治“作秀”。所以对有些批评皇帝过失的话，或者“即加处分”，有的即使“优容宽宥”，心里却“介介尚未全释”。我们并不惊异顺治帝会有这种心态，因为这对于握有最高独断权力的封建君主来说，抱有这样的想法是毫不为怪的；使我们略感惊异的倒是如此坦率的自白，应该说这也是难能可贵的了。但“求言”既然不过是一种政治“作秀”，必定难以收到切实的效果，则是确定无疑的。

第二、正由于出发点存在问题，所以顺治帝对于群臣的意见和建议，并不认真对待，往往束之高阁，置之不理。顺治十七年六月一日(1660年7月7日)，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朱之弼上疏说：“顺治十二年下诏求言，内外千百疏，部复未见施行。臣请此次应诏章疏，倘有事关大利大害、宜因宜革者，祈皇上俯赐裁决。”(《清世祖实录》，卷136)一方面指责群臣“虚文塞责”，一方面对群臣的章疏视若无睹，不理不睬，岂不是叶公好龙，大臣们哪里还会有建言献策的积极性？

第三、更加重要的，是顺治帝自食其言，在